

*Buddhism in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By Kenneth K. S. Ch'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xii, 560. Glossary,  
Chinese Names and Titles, Bibliography, Index. \$12.50.)

佛教是流傳於中國最長久，影響社會文化各方面最普遍和最深入的宗教。雖然其始由印度經西域傳來，然自漢代傳入後，經過兩千年來跟中國固有文化發生的關係，從衝突到調和，久已融滙於中國文化中，成為不可分割的重要部份了。假使研究中國文化而忽畧其中的佛教成份，則所得的了解會是不完全和不正確的。而過去我們的祖先如何吸收和融滙外來高等文明於自己文化中，使本身文化更充實和豐富的寶貴經驗，實在是中國文史哲研究的一個大題目。然而，近代中國學術界對這方面的興趣似乎不高，有關的專題論文固然少見，學術性的中國佛教史專著尤其鳳毛麟角；除了湯用彤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和陳垣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外，更難再舉。較之日本和歐、美漢學界對這方面的有關專著與論文，無疑是瞠乎其後了。並且湯氏之書不述隋、唐以降的史事，陳氏之作又僅限晚明雲、貴一隅；換言之，以前從未出現過一部由中國學人寫成的貫串古今的中國佛教史。

直到1964年陳觀勝先生出版了他的專著中國佛教史概覽，纔彌補了這個缺陷。本書是第一部由我國學人完成的，從漢代佛教開始傳入，一直講到中共中國佛教協會於1961年活動情形的中國佛教史。

本書出版後，好評如潮，到現在所知有十種書評，在香港我僅能讀到其中五種，它們的作者是：Leon Hurvitz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65); W. Lawrence Highfil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5); Stanley Weinste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66); Arthur F. Wright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66) 和 K. P. K. Whitaker (*Asia Major*, 1966)。諸評中除了部份橫加譏諷外，其餘的對本書均一致稱譽，即使就內容方面提出若干修正，也是建設性而非破壞性的。本書在海外的成就如此，很應該讓海內讀者也對它有些認識，因此仕邦試為此書評，稍作介紹。

本書分五編，共十八章，而章中有節，節中再分小節（合起來共151節，另

31小節)，故 Highfill 氏之評認為結構清晰。爲了篇幅有限，今僅畧述各章內容大概。

首編共分第一、二兩章，畧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向外傳播和來華途徑，爲了淨土思想在中國流行，故特立“Iranian Influence”一節（見P.15）以述「阿彌陀佛」的來源。其次介紹中國固有的思想主流——儒家和道家，繼爲早期的中國佛教史料的論述，漢代流行的佛經與佛教的存在形態（漢人視之爲道教的另一形式）。

次編論佛教在中國的茁長與適應，共分五章：

第三章主要論述般若思想與玄學合流，因而接觸到中國文明的高層，引起社會上的領導階層——高門大族——歸信佛教，於是不論在南方的東晉或北方的二秦和北涼，佛教都大大地獲得發展。本章立專節論述的人物有支遁、佛圖澄、鳩摩羅什、僧肇、曇無讖和法顯。

第四章專論述三位對佛教在中國奠定基礎貢獻最大的僧人——道安、慧遠、道生祖孫三代的生平、思想和事功。

第五章論述佛教一方面自宋迄梁都受到帝王公卿的外護，涅槃經的研誦與成實、三論兩宗思想流行，而另一方面，佛教又受到若干知識份子反對的情形。本章爲立專節的人物有齊竟陵王、梁武帝、真諦和反佛的范縝、荀濟。

第六章論述北魏太武帝的奉佛與毀佛因緣，曇曜的復興佛教，北魏的「僧祇戶」、「佛圖戶」和雲崗、龍門兩著名石窟，而對龍門刻像敘述甚詳。最後論述北方緣於研究涅槃經和誦習「偽經」而導致的「判教」思想。

第七章論述北周由佛、道教爭導致周武帝的毀佛，及隋文帝復興佛教，和他企圖以佛教治國。最後一節論述中國分裂時期佛教獲得發展的因素，以爲本編的總結。

三編論述佛教在中國成熟及被容納的情形，共分六章：

第八章首先在序言中指出佛教在唐不論政府的支持，帝王公卿的敬信，民間的傳播，宗派的建立，經典的譯出都發展至最高峯。其次論述太祖、高宗、武后、玄宗四朝帝王對佛教措施的目的與真正態度；武宗毀佛的遠因近因，和傅

奕、韓愈的反佛理論等。末言唐代西遊僧人，舉玄照、玄奘、義淨為代表。

第九章以唐代為中心（本編以下各章均同），專論述僧尼落髮前的社會背景，出家加入寺院的途徑（私度、官度、考試、帝王恩准和買道牒），政府的管理（設立「僧官」與沙汰僧尼）和僧尼的生活來源與私有財產的情形。每事都上溯唐以前的淵源。

第十章論述唐代寺院如何使佛教普及於廣大民間的種種活動。如經濟活動（水碓、榨油、旅業、典當、寺田等），娛樂活動（以燈節、孟蘭節、齋會等吸引平民入寺遊覽），教育活動（如講辯經義、演唱變文等）和各種慈濟事業。並言及寺田免稅和富人利用「功德院」的建置來逃稅的害處。Hurvitz 與 Wright 兩氏之評對本章甚為推崇。

第十一、十二章論述佛教各宗派的成立，它們的教義大概和重要宗門人物。前章言三階教、律宗、俱舍宗、天台宗、法相宗和密宗。Hurvitz 甚稱許本章對法相教義的描述。後章專論在華流傳最長久和最廣泛的淨土宗和禪宗。

第十三章論述西天傳來的經、律、論三藏譯出方式的演變（「譯場」的進展），翻譯遇到的問題，目錄的編纂，大藏的編輯與刊行（這兩事一直講到近代）等。最後介紹兩部在華最流行而又已譯成西方文字的佛經——妙法蓮華經與維摩經。

四編論述佛教在中國衰落的情形，共分四章：

第十四章，陳先生在序言中指出宋代僧侶數量也許比唐更衆，而其經濟活動或更形廣泛，然佛教在許多方面已大異於唐，如再無傑出的高僧，再無新宗派建立，再無重要經典被譯出；而歷朝發展下來的各系佛教思想也消失於宋，佛教已成抱殘守闕的宗教了。本章論述佛教衰退的原因，如僧伽本身道德的敗壞，外來的影響（如理學興起取代了佛教的精神領導，科舉使人才無心宗教生活，印度佛教亦衰落）等。並言及此時禪宗與淨土宗的活動，及「禪教合一」等口號下達成的宗派間的協調。

第十五章論述遼、金異族政權下中華佛教的發展情形；及以後元朝統治前後蒙古人與西藏喇嘛教的關係，元代佛、道諍鬥等。最後一節論述假借佛教名義

而組成的反抗異族政權的秘密會社：彌勒教，白蓮教和白雲宗。從這些會社的產生，以見佛教的深入中國民間。

第十六章主要論述明、清兩代帝王雖然也熱心於建寺度僧，但這時佛教已需要借重道教和儒家來支撐（如提倡遵行道教思想的袁凡了功過格；僧人元賢、智旭援孟、荀理論說明儒與佛並存不悖等）。並述及這時的宗派合流，居士運動（Laymen Movement），滇、黔佛教的特殊發展和西藏喇嘛教的宮廷活動等。立專節論述的人物為袿宏大師。

第十七章論述太虛大師的佛教革新運動（如創立中國佛學社、選送僧人出國留學、辦期刊等），淨土、法相兩宗的復興，中共的組織中國佛教協會及未來展望等。

五編為結論，僅有一章，即第十八章，從儒學、道教、文學、語言、聲韻學、繪畫、天文、曆法、醫藥和華人宗教生活等方面論述佛教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並指出佛教自傳入後，為了適應環境而漸漸的愈來愈中國化，故能予中國人的生活以這許多方面的影响。

讀了上述十八章，知道本書不特對佛教在華兩千年來的發展作了全面性的觀察，並且將歷來興衰大事的歷史關鍵都分別論述。因為全書範圍如此深廣，故陳先生徵引史料的目錄合起來便有四十四頁（PP. 505—548）之多，其用力之勤可見。而所搜集的史料除了古代文獻外，大部份是近代中、日和西方文字寫成的專著和論文，故本書可謂採珠聚玉而成，也可視為近代中外學人對中國佛教史研究成績的一次總結。這四十多頁目錄所收的資料不特經過精選（參P.521對日本研究唐代論著取舍的說明），並且附有評語，對研究中國佛教史上的個別問題，很有引導作用，陳先生在全書的總序上曾申明此點。

Weinstein 氏的書評指出陳先生以近五百頁的有限篇幅概括了中國佛教的社會、教義和文化的主要形態，是經歷一番艱鉅的苦功。仕邦以為陳先生著書時的用心用力處，可自如下的例子中見之：

(1) 玄奘是中國佛教史上最有名氣的高僧，他真正的事功與貢獻固然甚大，他的艱苦求法歷程經過小說西遊記的渲染，「唐三藏」的大名更婦孺皆知。而本

書沒有給他立一專節，僅在第八章的“Chinese Pilgrims”一節中佔一小節(P.235)，難道玄奘不值得專節表揚？若我們從玄奘的貢獻上看，就能明白陳先生的深意。因為玄奘的主要貢獻有三點：第一、親遊域外，歸國後寫成大唐西域記，把見聞留給我們。第二、歸國後譯出佛經千餘卷，大量輸入佛教義理於中華。第三、把唯識學傳來此土，並建立研究這一系思想的法相宗。然而，在他以前未有人作同樣的貢獻嗎？答案是否定的。蓋第一位親遊印度，而其遊記（佛國記）遺留至今的，應該是晉、宋之際的法顯。第一位大量譯經，使中土道俗大大增進對佛教了解的，應該是後秦的鳩摩羅什（什公譯經的影響大於奘公，如妙法蓮華經和維摩經即什譯）。第一位將唯識論正式介紹到中國的，應該是陳代的真諦。換言之，玄奘的貢獻不是創始性的，就整個佛教史來說，其意義比不上這三位前代高僧，故本書給這三人立專節（見 PP. 81, 89, 131）。而玄奘則因第十一章的“The Fa-Hsiang School”一節（P. 320）和第十三章的“Translation Techniques”一節（P. 365）均已述及他的開宗與翻譯，餘下求法一事，便佔一小節已足。

（2）第四編述由宋朝至現代千餘年的佛事，僅有株宏與太虛二僧立專節（見 PP. 443, 455），何以故？蓋作為本編標題的“Decline”一詞，指宋以後中國佛教已無新的義理發明，又失去社會上的精神領導地位而言。而本編所述的，是佛教在衰落時期仍能流傳迄今的原因。株宏和太虛，正是佛教向逆境奮鬥的代表人物，他們對佛教本身和對社會所鼓吹倡導的種種運動，不特當時大見其效，並予日後以深遠的影響，如株宏推行功過格和提倡「念佛」，形成了明、清以至今日的教佛以居士為中堅的運動（見 PP. 436, 445, 447）。太虛的興學與外交，使僧徒自寺院中解放出來，中共中國佛教協會的外交活動，實際仍循太虛遺規。（PP. 456, 457, 466）故立專節以示兩人為大時代的表徵。

（3）本書各編每一章的先後，不過依時代排列，獨第三編則否。我們從它們次序的先後，也略可看出作者的心思。第三編全部以唐為中心，故第八章先述唐代的歷史。宗教必須由教士領導，故第九章講僧尼問題。若僧尼不傳教則佛法無從推廣，故第十章講寺院對社會的種種活動和招誘。僧眾除了運用各種手段吸引普羅大眾外，還需進行高深義理研究以誘導知識份子，故第十一、二章講各種宗

派，以見佛門義理的多采多姿。高深義理的發明皆由研讀佛經而得，故第十三章講佛經的翻譯、編輯和刊行。這不是很引人入勝的暗示嗎？

### 曹仕邦

*Reformer in Modern China: Chang Chien, 1853—1926.* By Samuel C. Chu.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xiii+256.)

本書係畢茨堡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朱昌峻先生的博士論文，由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1965）。全文182頁，後附註、中、英文名詞對照、書目、及索引，全書共256頁。據作者前言，這篇論文由兩位教授指導，經多人協助審訂成書。全書分九章：一、緒論；二、張謇早年的生平；三、大生及南通的工業；四、張謇與國家大事；五、張謇與教育改革；六、墾牧與鹽政改革；七、導淮；八、南通的現代化；九、現代化的推行者張謇。

短短不過二百餘頁的一本書，要包括這許多史實，已非易事，加以文言、白話的資料，皆要譯成英文，益見難能。上到國家大事，下至廠務校務，無不涉及，而全文簡潔扼要，有條不紊。並且字字有據，事事徵引，可以按註翻查。這是本書最大的特點，也是本書所以值得一讀的原因。

張謇的傳記，雖已有人做過，但仍未令人十分滿意。這本書既以英文寫出，對外國讀者，自然貢獻很大。即使對中國讀者，也能使我們更多的、更深入的了解我國近代歷史。而對於治歷史的人，更具有另一種意義——可以看出用西洋方法治中國歷史的門徑和它的優劣所在。作者所用材料，大部份我們可以看到，因此可知作者對史料的剪裁與處理。

現在先按章畧舉全書內容的要點如下：

第一章扼要論述十九世紀後半期中國國情：西洋工業文明的侵入，引起了維新與守舊的矛盾；鴉片戰後的洋務運動，太平天國及捻匪之亂，中央大權之僑落於督撫手裏；日本的立憲並戰勝帝俄對中國政體的影響；外貨的輸入和部份士大